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现实背景、 核心特征与原创贡献

王 俊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这是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道路是内外联动的开放道路、规则重塑的开放道路、创新驱动的开放道路、合作共赢的开放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彰显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国际关系学说和分配学说;实现由渐进式开放向系统性开放跃升,取得全球“共性”与国家“个性”辩证统一、改革与开放辩证统一的发展范式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平衡协调包容发展,实现了实践路径重大创新。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习近平经济思想;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开创“合作共赢”新机制,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重点,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总结中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在这条开放道路上,我国逐步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与全球贸易的“中枢”。经验表明中国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不采用西方国家惯用的开放模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同样能够取得成功。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的现实背景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既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也面对着国内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全球发展中的新挑战

1. 全球产业链“泛政治化”倾向

“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全球产业链扩张的动力衰退,推动了产业链向着本地化、区域化和多样化

王俊,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教授(广州 510006)。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目标和重点任务研究”(22AZD053)的阶段性成果。

方向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还以国家安全、战略合作的名义,在其政治盟友间建立“集团化”产业链,对中国构建起“小院高墙”系统。在美洲地区,美国以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为载体,通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中断等方式,加强政治盟友间合作。在欧洲,美欧组建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在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建立十个工作组,推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治理体系建设。以建立“民主科技联盟”方式,推动全球创新体系的“去中国化”。在亚太地区,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的绝大部分成员国纳入其中,欲以 IPEF 替代 RCEP,将中国排除在外。

2. 全球治理体系“区域化”转变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主导并构建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防范经济危机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传统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冲击,也不能适应全球产业链重构对降低制度性成本的新要求,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区域治理体系转变。G20、APEC、“一带一路”等一批新型区域化治理平台出现,超越了种族、文化等界限,以寻求人类共同利益为原则,推动了区域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依据紧密的经济依存与产业互补关系,构建的区域治理体系,促进了区域政策协调,有助于提振区域竞争力。而且,区域治理体系不仅着力解决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准入问题,而且还将应对生态环境、知识产权、粮食危机、劳工标准等各国共同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

3. 全球发展失衡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和推动的全球价值链,存在着各国参与机会不均等、分工地位不均等、收益分配不公平等突出矛盾。一些欠发达国家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沦为初级产品供应地。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是“受益者”,但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高端,承担高附加值环节,获取高额收益,造成全球收益分配失衡。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1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0 年全球陷入贫困人口数量约增加 1.2 亿,极端贫困率上升至 9.5%。在粮食问题上,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态》报告指出,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 年全球粮食短缺人口大幅增长,亚洲面临食物短缺约有 4.18 亿人、非洲约有 2.82 亿人,拉丁美洲约有 6000 万人。全球约有 7.2 亿至 8.11 亿人口正在面临饥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10%。

(二)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需要

1. 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

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并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来看待。这就要求在新时期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高质量发展提升富裕层次和水平。传统的“先行先试”开放思维、价值链“低端嵌入”开放路径以及区域间“非均衡”的开放战略,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开放较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开放洼地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为此,我国需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体系,形成区域间更加协调和均衡的开放格局。

2. 纾解生产要素流动堵点的需要

我国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方面,由于区域分割、城乡分割,使得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受阻。在资本流动方面,各地区税收政策不统一、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制约了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存在地区限制,尚未形成“用脚投票”机制;在技术流动方面,通过行政力量配置技术要素的做法仍然存在,缺乏有利于技术转移的专业服务机构,还不能高效率地将科研成果与使用企业连接起

来;在数据流动方面,在数据确权、数据开放、数据存储、数据交易等方面,缺乏治理规则,制约了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为此,我国需要通过高水平开放,学习和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制度,破除制约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类壁垒,推动境内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3. 化解我国“深层次改革”矛盾的需要

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各种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各种矛盾更加凸显,具体包括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矛盾、社会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分割城乡发展差距的矛盾等。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化解各种矛盾的关键。为此,我国可通过高水平开放特别是开启制度型开放,抓住“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历史契机,推动政府监管模式创新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化解矛盾和防范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的核心特征

中国对外开放是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制定相应的开放战略、实施制度创新与政策措施(全毅,2022)。按照时序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2001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施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渐进式开放策略;2001—2012 年,以加入 WTO 为契机,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逐步拓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2012 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拓展,初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道路(杨丽花、王跃生,2020)。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是内外联动的开放道路:要素和商品双向流动、内外循环畅通;规则重塑开放道路: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与引领构建高标准规则,推动国内外规则的协调与兼容;创新驱动的开放道路:由要素驱动型对外开放转向创新驱动型对外开放,并推动贸易方式创新;合作共赢的开放道路:以合作共赢方式利用全球资源、建立分工体系与分享成果收益。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是对以往改革开放成果的继承和创新,为促进要素和商品双向流动、生产过程创新驱动以及全球互利合作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并将以往灵活的市场开放转变为稳定的制度型开放,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制度安排。

(一) 内外联动的开放之路

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不是一味强调对外开放,而是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不是单向的对外开放,而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进口与出口兼顾的双向开放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也不是仅仅依赖外循环或内循环的对外开放,而是双循环畅通与互动的开放道路。

1.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以对内开放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层次。从两者的辩证关系来看,深化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基础条件。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破除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重要动力。第一,推动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区域协同发展。我国积极推动京津冀都市圈、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支点地区与“一带一路”中的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有效对接(黄征学,2019;钱书法等,2021)。同时,“巩

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先发优势,强化创新驱动战略,率先建立起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要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开拓西部市场这两篇大文章。西部地区要在大开发中大开放和大发展,逐步由内陆地区转变为开放前沿。第二,推动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产业协同。在对外开放领域始终关注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形态高度化和产业发展转型,并且要重视全球生产分工和中国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在发现诸如存在比较优势陷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等潜在产业风险时,及时以国际贸易政策推动与国内产业规制和政策的联动,协同推进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内产业高质量参与国家生产分工。积极拓展与全球重要贸易伙伴国家(地区)建立产业合作机制,通过积极利用生产资源的跨国配置机制,开创东西互济、国内外要素高效联动的产业协同机制。

2. 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在国际贸易方面,我国从最初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转变为进出口兼顾发展模式。2001—2020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7.6倍,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量第一的国家,也是国际分工的“枢纽”国家。近年来,我国实施扩大进口战略,贸易顺差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5939亿美元之后,开始收窄,至2020年贸易顺差缩小为5239.9亿美元。农产品和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额逐年上升。20年来,农产品进口总额增长52倍,原油产品进口总额增长15倍。中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2020年贸易逆差已扩大至947.7亿美元,同比上升了32.9%。我国也是全球资源类产品进口大国,2021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6%。大宗商品进口缓解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瓶颈,增强了我国重要物质供给能力,拓展了生产边界(见图1)。在国际投资方面,我国从最初的“引进来”为主,演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模式。2001—2020年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6.1%,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近2万亿美元,已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的第一大国,通过引进外资缓解了我国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最近10余年来,中国新增储蓄和存量资本形成了巨大规模。2020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资本相对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更加丰裕,具备了资本双向流动以及全球配置的条件(江小娟、孟丽君,2021;黄群慧、倪红福,2021)。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直接投资等方式走出去,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分工。

3. 经济内外循环畅通

从经济运行方式来看,我国从最初的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转向了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新阶段。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20年间,我国内需占GDP比重平均约为108.62%,内需贡献率有7个年头超过100%。同期,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2019年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已经下降至25.2%,外贸依存度由2006年时的64.2%下降至2020年的31.42%。内循环为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立足于国内大循环,实现双循环互动与畅通,而不是搞封闭的循环。这一战略转变也是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以及全球经济低迷引致的外需萎缩的重要举措。

从市场主体方面来看,我国已形成以内资企业为主,多种类型市场主体协调发展的结构,这也是“内循环为主体”的重要基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共有2505万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约有2283万家、集体企业约有11万家、外资企业约有13万家。在各类企业中,民营企

业占比最高,约占 91%。从各类市场主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来看,外资企业产值占 GDP 比重约 2%,直接创造税收约 17%。民营企业产值占 GDP 比重超 60%,创造了 59.7% 的税收,带动超过 80% 城镇劳动就业,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最高。从进出口来看,从 2019 年开始,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资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020 年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约为 21829.5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了约 10%,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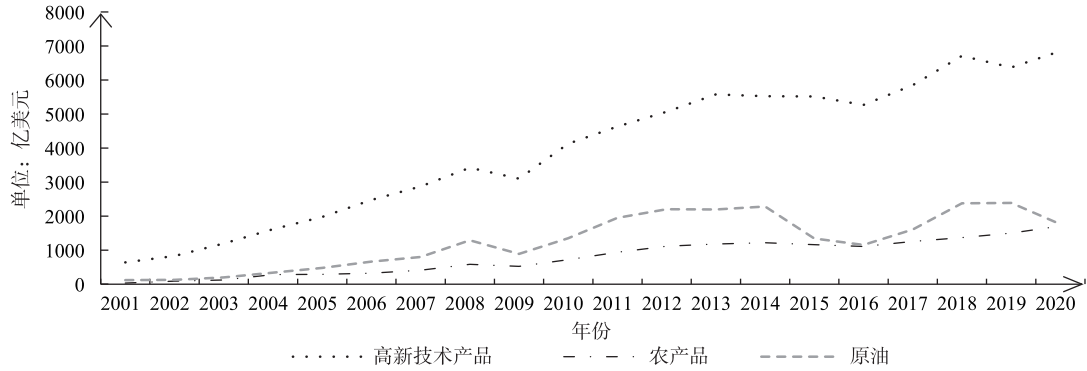


图1 部分产品进口总额变动情况(2001—2020年)
数据来源:商务部

(二) 规则重塑的开放之路

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并不局限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而是开启了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通过国内国际制度互动的方式,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刘彬、陈伟光,2022)。

1. 主动对接国际规则

加入 WTO 之后,不断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总体关税水平由 2001 年的 15.9% 下降到 2021 年的 7.49%。非关税壁垒也远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大国。我国学习和遵守国际规则,并修订国内法律法规,缩小了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距。在商品流动方面,2005 年 1 月,我国取消了普通商品的进口配额。在资本流动方面,我国推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动了资本双向流动。外经贸部清理了 1413 件文件,其中外经贸方面法律 6 部,行政法规 164 件,部门规章 887 件,双边经贸协定 191 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72 件,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93 件(陈大鹏等,2021)。

学习和遵守国际规则,并不意味着国际国内规则完全协调与兼容,事实上,国内外之间仍存较大的制度差异。据 GTA 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8 年,中国遭遇了全球 145 个国家或地区发起的贸易摩擦,占到全球贸易摩擦总频次的 10.96%。中国也是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图 2 列出了 2000—2020 年期间,中国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数量。贸易摩擦多与我国贸易体量巨大有关,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规则制度在很多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还不相容。为此,我国开启制度型开放新阶段,主动对接国际规则。第一,主动对标国际规则,补充和完善国内规则。有些制度国内还不完善,通过对标对照国际规则,逐步加以完善。第二,对标国际规则,对施策分类。国内有些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加以甄别,对施策分类。比如,自由贸易协定中实施的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等规则,与我国的国有企业政策相比有许多不兼容的地方。国有企业承担了其他企业不需承担的经济、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倘若强行推进竞争中性原则,将加剧国有企业生存风险,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短期内难以彻底实现竞争中性的要求。对此,我国应稳妥推进,逐步建立起融合竞争中性的竞争政策。

2. 引领构建高标准规则

学习和遵守国际规则是制度型开放的关键环节,也是融入全球化的关键一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美国等霸权国家地位衰落,制度型开放将由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向引领构建高标准规则转变。第一,在贸易与投资等传统议题上,积极探索制度创新。构建高标准经贸规则并不仅仅是更低的关税、更少的服务贸易准入限制和更少的外资股权限制,而应更多地体现在以制度创新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层面。我国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对外开放实践中,开展了贸易体制、投融资机制等多项制度创新。比如,在“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新体系中,构建了风险共担、融资规则透明、运行高效、多边沟通的融资体系,提出了金融监管合作、投融资方案、债务违约处置、投资保障机制等新方案。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在货物贸易、服务和投资领域,将全面开放和国民待遇确定为基本原则,而将开放限制和非国民待遇作为例外(崔凡,2022)。第二,在边境内新规则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随着美墨加协定(USMC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一批巨型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全球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发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重心已转向了高标准的边境内规则,涵盖了数字贸易、劳工问题、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这些议题超出了WTO多边贸易框架下的规则范畴。在新一轮规则制定中,我国在具有一定优势的领域中,可以引领构建高标准规则,尝试率先建立中国标准。比如,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无纸化贸易和电子传输免关税等数字贸易便利化规则的实施,我国在欧式模板与美式模板比较的基础上,可以考虑率先建立起“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和“源代码保护”等新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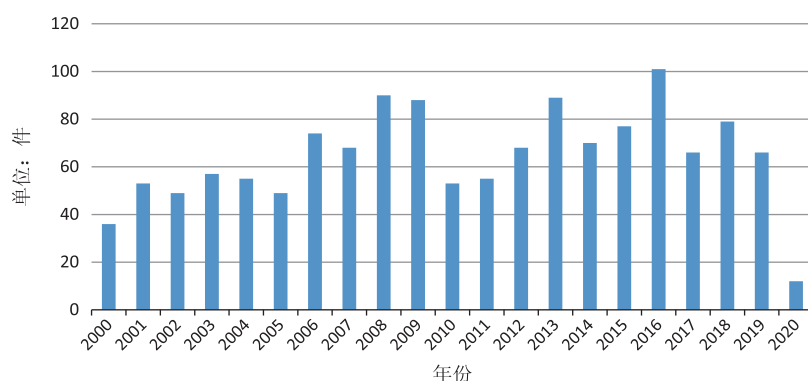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面临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数量(2000—2020年)

数据来源:全球关贸数据库(GTA)

(三) 创新驱动的开放之路

从对外开放的动力机制来看,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已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推动了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1. 开放的动力转向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廉的要素成本嵌入全球价值链,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我国在产业链低端和高端分别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端挤压”。以劳动力为例,2020年我国15—59岁年龄人口相较于2010年减少了4000多万;202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97379元,相较于

2010 年增长率约 9 倍。与我国相邻的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正以低廉要素成本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目的国,越南劳动力平均工资仅为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我国“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制造业受到了要素成本更低国家的挤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相继进入萧条阶段,为了提高本国的就业率,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的再工业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产业链的稳定性。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依据 201 条款、301 法案对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大规模征税,并将一些高技术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和“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进行严格审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夹击下,以要素投入驱动的开放道路难以为继,亟需转向创新驱动。近年来,我国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正在不断提升,创新的驱动力正在加快形成。《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 12 位,连续 9 年稳步上升。在创新投入方面以及在专利、商标申请、创意产品出口占比等创新产出方面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利于解决频繁出现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道路,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与产业发展“做大做强”。

2. 贸易方式创新

创新贸易方式,大力推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的发展。第一,推动服务贸易业态创新。服务贸易作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中的新生力量,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服务贸易将促进服务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及服务产品全球流动,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2012—2018 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达 4.19%,是同期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速(1.1%)的 3 倍多。中国服务贸易总体规模也是不断增长,2000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 664.61 亿美元,2018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高达 7319.73 亿美元。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数字技术和传统服务贸易加速融合,催生了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跨境文化交流等服务贸易的新业态,以及海外仓、智能物流等交通运输服务贸易新模式,为服务贸易行业升级带来了新机遇。第二,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新时代产业、企业等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依托于数字贸易平台,精准定位细分市场,企业可以及时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激发消费新动能。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19 年全球数字(出口)贸易总额为 31925.9 亿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升至 12.9%。自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数字贸易一直加速发展。其中,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规模分别为 24310 亿美元、7203.9 亿美元、411.9 亿美元,在全球数字服务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 76.1%、22.6%、1.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2015 年的 18.6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45.8 万亿元。同期,数字经济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4.2% 增长到 40%。我国数字贸易额由 2015 年的 2000 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947.6 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从 30.6% 增长到 44.5%。数字贸易已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四) 合作共赢的开放之路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对外开放走的是一条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推动解决全球贫困、粮食危机、发展失衡等问题,实现经济全球包容性增长。

1. 以合作共赢方式利用外部资源

对外开放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自然资源以及企业家、技术、设备及管理等高端要素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中国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非“掠夺式”或者夹杂着政治等其他因素的不对等交易,而是以合作共赢方式配置资源,实现国家间互惠互利。不搞排他性安排,鼓励各国积极参与。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估计,从2016年到2040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严重制约这些国家民生改善和摆脱贫困。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起点,高质量建设了雅万高铁、亚吉铁路、中泰铁路、中老铁路等一批基础设施,直接带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客运和货运往来,推动各国家的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由倡议之初涵盖中国、东盟、南亚、中亚、西亚、独联体和中东欧,现已延伸至非洲、拉美以及南太平洋地区。通过跨国并购、承包工程等方式开展深入的经贸合作,将中国优质的产能、技术和价格优势,与亚洲、欧洲、非洲等地区广大市场的需求、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区域利益共享链。

2. 以合作共赢方式构建分工体系

全球出现的极端贫困以及发展失衡,一定程度来源于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无法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是以合作共赢方式构建分工体系,推动了全球包容性增长。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应该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截至2019年底,中国有2.7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4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2万亿美元,与亚洲、欧洲、北美、拉美、非洲市场形成“海陆并进、内外联动”的产业合作网络。我国倡导以及正在着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产业合作网络,使得全球分工体系更加安全和稳定。依据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构筑“多层次”产业合作网络。对于要素禀赋与我国相异国家,探索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要素禀赋相似国家,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加快要素国际流动。

3. 以合作共赢方式分享成果

受到区位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要素禀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没有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而部分发展中国家退化为能源与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获取微薄收益。我国对外开放倡导共享全球化收益。我国倡导构建的合作共赢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领头雁”国家在基础设施、资金保障等方面为“雁尾”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提高了产业链聚合能力,确保了参与国分享合作红利。此外,我国还积极对外援助,推动全球成果共享,以应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难题。2020年我国对外援助已达到203.04亿元,相较于2001年增长了约3倍;实施的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受援国多达160个国家(见图3);除了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之外,还援助了卫生、教育、体育等民生项目,极大地促进了受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1亿剂疫苗,成为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2022年6月,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就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达成部长决定。我国作为新冠疫苗生产和供应大国,主动宣布不寻求享受豁免决定所提供的灵活性,彰显了大国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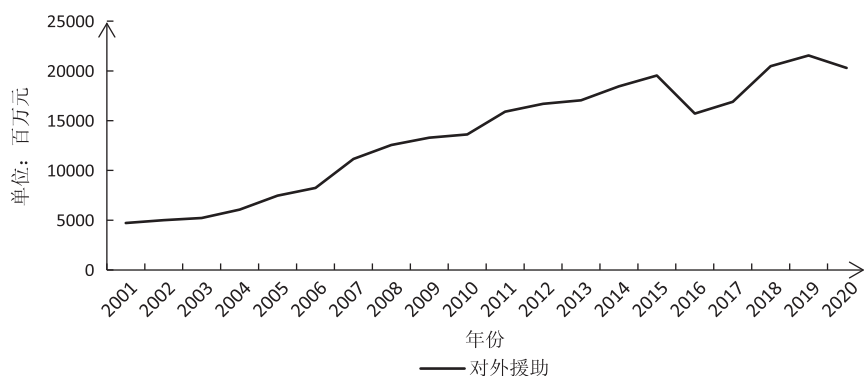


图3 我国对外援助情况(2001—2020年)

三、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的原创贡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开创了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道路(李琼、薛雨西,2020;赵龙跃,2022)。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道路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科学而丰富的意涵,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发展范式重大突破以及实践路径重大创新。

(一) 重大理论突破

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道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以及世界市场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世界市场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主要矛盾扩展到世界范围的重要桥梁。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道路进一步阐释了如何在开放中增进人类福祉、如何实现开放合作、如何推动互利共赢等重大理论问题。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人的自利性倾向,后来的学者为了将分析问题简单化,构造出了“经济人”假设,并逐步演化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和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沿用此假设,经济学探究了经济主体(政府、厂商和居民)的行为、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竞争、交易等)以及由此构建的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和调控(王曦,2022)。然而,按照“经济人”假设必将出现劳动异化、社会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正如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所说的,社会将分化成底层阶级和有闲阶级,而“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竞赛,这四个活动成为上层阶级的主要生活方式”。^①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种社会是“不幸福的”,“国民经济学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②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对外开放道路摒弃了“经济人”假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阐明为“以人民为中心”,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与实践目标。这一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

①[美]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的行为分析》,斯凯思译,北京:地震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国的对外开放及经济发展都是以实现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切实保障全体人民更高层次的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感和获得感。

2. 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说

当今世界尽管霸权国家地位衰落,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全球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调整。完全依靠市场竞争,以效率导向的自由化和开放化必然导致全球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粮食安全危机、价值链断裂,甚至引发战争和局部冲突。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解决了全球发展与开放的世界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理念,构建了国家间新型关系,这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建立平等互商的伙伴关系、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开放创新与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3. 坚持“合作共赢”参与全球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分配学说

发端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经伊·菲·赫克歇尔、戈特哈德·贝蒂·俄林、保罗·克鲁格曼、马克·梅里兹等人扩展延伸,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学说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分工地位必然趋于固化。技术落后、高端要素稀缺、生产率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锁定”局面,甚至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沦为全球初级产品供给商,陷入“贫困化增长”漩涡。沿着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全球分工和收益分配,必然导致全球发展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合作共赢”国际合作新机制,解决了全球包容性发展问题。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以及关注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诉求,通过自身发展,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将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使各类经济体都能从中国发展以及全球分工中获取成果收益。中国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对外开放实践中,向全球提供了基于共商、共建、共享模式下的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利益分配失衡提供了中国版方案。中国以“合作共赢”方式配置全球资源和要素,解决了国家间“囚徒困境”式的恶性竞争,突破了“比较优势”理论局限(安礼伟、张二震,2020)。

(二) 发展范式重大突破

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抛弃了西方国家对外开放“赢者通吃”“弱肉强食”发展范式,塑造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崭新范式。从渐进式开放向系统性开放转变,全球“共性”与国家“个性”的辩证统一,改革与开放的辩证统一等范式创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

1. 实现渐进式开放向系统性开放的跃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由点线到面、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开放道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开放风险,降低试错成本,避免因局部失误影响整个开放进程。从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为标志,掀起了对外开放的序幕,2001年加入WTO,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历史行进中逐渐由渐进式开放跃升至系统性开放,构建了包括对外开放的范围、幅度、路径、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内容的系统性集成式开放谱系。从制造业领域为主的开放到服务贸

易领域为重点的开放,从货物和服务为重点的开放到制度性开放,从学习遵守国际规则的被动开放到引领构建国际规则的主动开放,从以开放促改革到高质量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突破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沿江、沿海经济区、沿江经济带等碎片化的开放格局,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2. 实现全球“共性”与国家“个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研判全球化新趋势以及对外开放一般规律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提出的正确的开放道路。符合全球化普遍规律以及中国自身国情,实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首先,适应了全球化新趋势,反映了全球各国发展共性。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与各方利益,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同时,深刻揭示了全球进入动荡期和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大量滋生并不断加剧、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碎片化、匮乏化,由此引发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稳定性。中国开创的特色开放道路,坚持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式,体现了“代表性和包容性”,符合全球化新趋势,体现全球各国“共性”。其次,立足于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打开国门逐步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温饱不足到基本实现温饱、小康富裕再到如今的共同富裕,向世界展现出中国成就,也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开放道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充满了中国智慧。

3. 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改革与开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单纯对外开放,照搬国外的制度、经验和管理,必然会水土不服,不符合中国实际需求;相反,脱离了开放而仅仅关注国内改革,这种改革是缺乏目标和方向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封闭”式改革。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道路统筹了改革与开放,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高水平开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以及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倒逼改革,推动制度完善。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健全促进贸易投资政策、法律及规则体系,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更加优良的制度环境,推动高质量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 实践路径重大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对外开放道路的实践也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明确了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中心任务。在实践路径上,彰显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及走合作共赢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则,也为全球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1. 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出的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新时代,中国推进的现代化不仅要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那就是“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对外开放是中国

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了商品、要素、技术、服务等全球流动,促进了人民教育机会增多、社会法制完备、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提高人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领导下走出的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坚持和平发展,推动构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将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首先,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推动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而不是西方国家四化“串联”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基础;其次,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有助于打破地区行政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一体化流动,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逐步解决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协调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洪银兴,2022)。

2. 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推动了世界经济平衡协调包容发展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四是坚持创新驱动;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突出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平衡协调包容方向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方向。首先,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推动了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已成为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4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约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中国成为了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其次,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推动了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协调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这一论述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发展失衡、包容性不够的关切。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坚持合作共赢发展之路,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偿援助、优惠贷款,以及大量的技术支持、人员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协调包容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的新型对外开放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内容特色,强调国际国内商品、要素双向流动,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二是道路特色,突出和平发展的主基调,强调创新在对外开放道路中的引擎作用;三是制度特色,着力从中国市场化建设和对外开放进程中,构建国际国内相容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也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经验总结。展望未来,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开放道路,还应把握住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激活对外开放新机制、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在贸易与投资等重点领域,健全机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一是在投资领域,继续完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推动负面清单不断简化,确保外商准入后能够准营。加快构建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境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二是在贸易领域,积极构建贸易发展新机制。加快建立促进进口的机制创新,降低进口关税及各种非关税壁垒。特别是,要鼓励进口关键设备、零部件,以及研发设计等服务业进口;以完善出口服务管理制度为突破口,降低出口企业交易成本,激发出口企业活力;完善大宗商品的储备及管理体制,防止因地区冲突可能引发的物质断供等问题。

第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方案”。一是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改革,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二是积极推动与全球治理平台对接与协调,构建国际合作新机制。通过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治理平台,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新平台建设,搭建起多边对话和合作机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做出更大贡献。三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对外开放实践,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制度型公共产品,在全球减贫、发展失衡、维持全球供应链稳定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第三,防范和化解风险,提高对外开放的安全性。一是加强国家间对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及财政政策的联动性监测。密切跟踪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动向,关注国际资本流动趋势,有效防范资本市场风险;逐步建立起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监测、预警机制,有效防范人民币汇率风险以及跨国资本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冲击。二是建立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当前,频繁的贸易摩擦、地区冲突,对贸易与投资产生了较大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我国应建立起完整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及时防范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可能遭遇的产业损害行为,并建立起相应的调查、赔偿与支持制度。

参考文献:

- 安礼伟、张二震,2020:《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经济学家》第9期。
- 陈大鹏、吴舒钰、李稻葵,2021:《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经验和对新发展阶段的启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 崔凡,2022:《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与对接内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1期(上)。
- 戴翔,2018:《构建开放型国际经济新体系: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经济纵横》第12期。
- 洪银兴,2022:《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管理世界》第4期。
- 黄群慧、倪红福,2021:《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管理世界》第12期。
- 黄征学,2019:《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第9期。
- 江小涓、孟丽君,2021:《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第1期。
- 李琼、薛雨西,2020:《对外开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期。
- 林桂军、Tatiana Prazeres,2021:《国家安全问题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改革方向》,《国际贸易问题》第1期。
- 刘彬、陈伟光,2021:《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国际论坛》第1期。
- 刘志彪,2021:《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学术月刊》第9期。
- 马涛、陈曦,2020:《“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
- 钱书法、郑子媛、周绍东,2021:《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同机制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例》,《现代管理科学》第1期。
- 全毅,2022:《中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框架与构建路径》,《世界经济研究》第10期。
- 田旭、徐秀军,2021:《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
- 王曦,2022:《制度演进与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杨丽花、王跃生,2020:《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时代需求与取向观察》,《改革》第3期。
- 张夏恒、李毅,2021:《跨境电商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逻辑与实施路径》,《河南社会科学》第10期。

(责任编辑:蒋永华)

New Opening-u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Realistic Basis, Core Features, and Original Contribution

WANG Ju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pursued a more proactive opening-up strategy and has successfully embarked on a path of new-type ope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rategy is both a practical necessity to addres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a crucial compon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th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connectedness, rule reshaping,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and win-win cooperation. It is a path that aligns with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represents significant original contributions, enriches and develops Marxist theories of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stribution. This path signifie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gradual opening-up to systematic opening-up, balancing global commonality and national individuality, and integrating reform with openness. It has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uniqu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fostering a more balanced, coordinated, and inclusive global economy, and has achieved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in exploring the approach to practice.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opening-up road;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Economy; original contribution

About the author: WANG Jun, PhD in Economics, is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